

第一章 概论

“埃及”名称的由来埃及地处东北非洲。在古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并不把自己的国家叫做“埃及”，而是叫做“凯麦特”，意为黑土地^①。“埃及”这个名字是古希腊人对埃及古城孟斐斯（Memphis）的讹称。古代埃及人原来把孟斐斯城叫做“白城”，或叫做“普塔赫精灵的地方”（Place of the soul of Ptah）^②，音译为 Hat-Ka-Ptah（或 Hikuptah），希腊人将其读作 Aigyptos，现代英文的“埃及”（Egypt）即由 Aigyptos 一字而来。现在，人们沿用了 Egypt 这个字来叫这块国土，而原来埃及人称呼自己国家的名字却被人遗忘了。

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埃及的北面是地中海、西为利比亚、南接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即古代的努比亚）、东隔红海与阿拉伯半岛相望、东北角上通过西奈半岛与叙利亚巴勒斯坦相联。

现代的一些学者夸大古代埃及的孤立性和闭塞性；另一些学者则夸大古代埃及同外界的联系，甚至把埃及文明说成是一个又一个外敌入侵的结果。显然，这两种倾向都是不正确的，都有片面性。

古代埃及人实际上只是把尼罗河第一瀑布（在今阿斯旺水坝

① 关于“凯麦特”的意思，也有人认为按词义本身为“尼格罗人”，或黑色的人，表示法老埃及的居民是黑色民族。见莫赫塔尔主编：《非洲通史》，第2卷，第30—31页。

② “普塔赫”（Ptah）神是孟斐斯城的保护神，亦是艺术之神。希腊人将其比作赫淮斯托斯。但埃及人常将其与太阳神阿吞神结合在一起，叫做普塔赫—阿吞（Ptah—Aten）或与空气神苏结合在一起，叫做普塔赫—苏（Ptah—Shu），变成了一切自然之神，在埃及广受崇拜。

附近)以下的尼罗河谷和三角洲地区看作是自己的国土。河谷以东、以西都是沙漠,不适于人类居住,常常被埃及人看作是与自己的黑土地相对立的地方,是红土地的地方。

尼罗河从南而北流贯埃及全境。埃及人称尼罗河为河,或大河,叫哈皮(Hapi),什么意思现在不清楚。尼罗河发源于何处?古代埃及人是不清楚的,希罗多德也没有弄清楚,也不可能弄清楚。他只是说:“关于这条河,我所作的叙述,是我尽全力所能探索到的东西了。它是从埃及以外的地区流入埃及的”。^①只是到了近代,到了上一个世纪,人们才知道尼罗河的上游有两条支流:一为白尼罗河,一为青尼罗河。前者发源于非洲中部的维多利亚湖;后者发源于苏丹。两条支流汇合于苏丹喀土穆。尼罗河全长六千多公里,在埃及境内(在第一瀑布以下)直线有九百多公里,而按尼罗河本身则有一千二百多公里。

埃及这个地方,在第四冰期以前,曾是雨量充沛,水草丰美的地方。当时人们还住在离尼罗河很远的地方,因为那时尼罗河流域十分潮湿,蚊虫滋生,还不适于人类居住。后来,北非的气候干燥起来,原本雨量充沛、水草丰美的地方逐渐变成了沙漠而不能住人,尼罗河附近却慢慢地适于人类居住,人们才逐渐地进到尼罗河谷来居住。^②

上一个世纪,一位德国科学家 M·L·布兰肯霍尔恩(M·L·Blanckenhorn)推测说,以前,一个巨大的尼罗河的祖系(他称之为 Ur Nile),是流在现在的尼罗河以西的地方的。他主要是根据埃及西部沙漠中古代的砂砾的存在得出这一结论的,他认为那

① 希罗多德:《历史》, I.34.

② 参见霍夫曼:《法老前的埃及》(M·A·Hoffman,《Egypt Before the Pharaohs》)一书第 25 页上的图。

是一条古河道。这个推论曾一度被否定。^①但现代航空摄影的资料证实，在埃及西南部确有一条古河道的痕迹，这可能是古尼罗河的河道。

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尼罗河每年的定期泛滥，不仅供给了埃及以充足的水源，可以饮用和灌溉农田；而且尼罗河上游流经热带草原地带，泛滥时的雨水中夹带了大量的腐烂植物和矿物质，它们在埃及境内逐渐沉淀下来，成为植物生长的天然肥料，对农作物生长十分有利。古代著名的《尼罗河颂》写道：“光荣啊，起源于大地的尼罗河！你川流不息，为的是使埃及苏生！……你灌溉田地，使一切生物欣欣向荣。你生出大麦和小麦，好叫神庙里欢度节日。要是你水流迟缓，植物就会停止生长，全国人民都会陷于贫困。当你河水上涨的时候，大地眉飞色舞，一切生物都欢腾，大家开口笑呵呵。”^②

尼罗河每年的定期泛滥，很有规律，其时间是每年7月19日（这是按古埃及的太阳历，而按现代历法则为6月15日），在这一天太阳、天狼星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尼罗河亦开始泛滥。泛滥的水，溢过河岸，淹没了农田。泛滥为期四个月。河水退下去之后，田里留下一层厚厚的淤泥，将田界也掩盖住了。于是人们在河水退下去后，要重新丈量划定田界，而后耕耘播种。

尼罗河泛滥的原因是什么？古代人弄不清楚，以为是季风把地中海的海水涌了上来的缘故，还有其它一些更为荒谬的说法。^③现在我们知道，每年尼罗河的泛滥都是因为非洲中部的季雨造成的。

埃及在地理上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部分：南部的尼罗河河谷

① 见同上书、第28页。

② 《尼罗河颂》，中译文载：《古代埃及孩子的一天》。

③ 见希罗多德：《历史》。I.19—27.

(即上埃及,因为它是上游),其最宽处为 15—20 公里,最窄处仅 1—2 公里;北部(下埃及)为尼罗河三角洲,是由尼罗河的游泥冲积而成的,这里地势平坦,被尼罗河的支叉分割成许多块。上下埃及的分界线在今之开罗附近(古代的孟斐斯)。

上、下埃及在自然条件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上埃及气候干燥,几乎常年不雨;下埃及则由于地中海季候风的影响而雨量较多。

居民关于古埃及的原住居民问题,有着不同看法。^①一般认为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属哈姆—塞姆语系,创造古代埃及文化的埃及人是由原来北非的土著居民与西亚移来的人融合而成的。但西亚移民何时到的埃及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从古代埃及留下来的绘画、雕刻等资料看,古代埃及人同古代的努比亚人、利比亚人、亚细亚人显然不同,古埃及人的外部特征是:高个头儿,有着健壮的体魄,有宽而直的肩、宽脸、直鼻、低低的额头,黑黑的皮肤,兰黑色的头发,密密的睫毛,黑而扁的眼睛。

史料研究古代埃及史,主要根据三大类史料: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及僧侣体文字、世俗体文字等)的文献资料;古埃及的文物资料(如雕刻、绘画、城市、神庙、坟墓等建筑遗迹、日用物品等等);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著作等。

在本世纪以前,或者说在 19 世纪初法国学者商波良释读成功古埃及象形文字之前,人们主要是根据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著作来了解古代埃及历史的。

^① 如有的学者认为,埃及的新石器农业文化就是受西亚影响,或由西亚传过来的;有的学者认为埃及前王朝时代的涅伽达文化Ⅱ(或称格尔塞文化)也是从西亚来的民族创造的。但可能西亚居民的大量移入埃及,其时间要晚得多,或许是在第一和第二中间期里。当然少量的西亚人作为战俘进入埃及的时间可能要早。

在希腊罗马古典作家中，最先记述埃及情况的是希腊人。最初，希腊人并不是从古典作家的著作中去了解埃及情况的，而是从公元前 1 千年代前期在埃及的希腊雇佣兵、以及随这些雇佣兵一起来到埃及的商人和旅行家那里听到的有关埃及的许多轶闻趣事中了解埃及的。也有一些希腊的政治家，如梭伦，来库古等人到过埃及，后来（特别是希腊化时代）也有不少学者到过埃及。

现在所知希腊人中第一个报道埃及情况的人，是小亚西海岸的赫卡泰乌斯（米利都人，约公元前 510 年）和希罗多德（哈里克阿尔纳索斯人，公元前 480—430 年）。前者著有《系谱史》和《利比亚史》（均已失传），主要是报道尼罗河的泛滥、三角洲的形成，以及它的动物区系的情况，而关于它的居民情况的报道则较少。希罗多德是古希腊的著名史学家，古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家西塞罗称他为“历史之父”。他的主要著作是《历史》，记述希腊波斯之间的战争。该书将波斯一方的埃及、两河流域、小亚、伊朗高原、乃至中亚和印度河流域等地都作为叙述对象。关于埃及的历史与文化，主要记述在他的书的第二章以及第三章的前面若干部分中。希罗多德曾到埃及旅行过，到了尼罗河上的第一瀑布。但他在埃及呆的时间很短，现代的一些研究家认为他最多不过在埃及呆了三个月，因此对许多事物他不可能记述得很详细。另外，由于他的埃及导游、翻译的偏颇，因而他的记述难免有不少偏见和错误。尤其希罗多德不懂埃及文、没看过古埃及文献（包括各种文物上的铭文和神庙中的档案），而纯系别人的介绍，因此，他记述的不会十分准确。他的记述生动，有不少轶闻趣事，甚至离题很远的细枝末节。当然，他的记述也有不少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在地理方面、宗教方面。他提到过许多城市的名字、神的名字，是许多别的作家不曾提到过的。

属于罗马共和国晚期的西西里的希腊人戴奥多罗斯（Diodorus），曾于公元 59 年在埃及呆过一段时间。他著有《历

史集成》（《Historian Library》）一书，其资料来源除自己的亲身见闻以外，还吸收了公元前 4 世纪时的一个阿布德拉人（小亚）赫卡泰乌斯的著作《埃及史》中的资料（该书未保存下来），也来自希罗多德的书以及其他人的著作。戴奥多罗斯的著作较希罗多德的著作严谨，他常常批评希罗多德，但他的著作较为枯燥，不如希罗多德的生动。他的著作中有关于埃及宗教、军事远征，埃及的地区、土地、河流、植物、动物等的记述。在历史方面记载较简单，但有关于国王的生活的规定，行省的行政和等级制度、审判和法律、教育和医学、动物崇拜，死者的埋葬和崇拜仪式等。他书中有关埃及的部分有一个节录本（《戴奥多罗斯论埃及》）。

蓬图斯的斯特拉波，也是生活于罗马共和时代晚期至帝国初期的希腊人。他曾在亚历山大里亚住过若干年，约公元前 25—24 年，随罗马总督到过第一瀑布。他的《地理学》一书中有不少关于埃及的记述（在第 17 章等），其中他对埃及三角洲的各诺姆记载较详细。他关于地理方面的记述较为可靠，但关于历史等方面的记载却需要认真考证。

生活于罗马帝国初年的希腊人普鲁塔克（公元 46—120 年）所写的论文《伊西丝和奥西里斯》，讲述了有关奥西里斯的故事，为研究埃及宗教提供了重要资料。

生活于罗马帝国初年的老普林尼（公元 23—79 年）的《自然史》，也有关于埃及的一些记述。

此外，柏拉图、克劳狄·托勒密、恺撒等人也有关于埃及的一些记述。等等。

反映古埃及史的情况的古典作家的作品的特点是，他们生活的时间离事件发生的时间太久，这些作家本人又不懂古埃及的语言和文字，仅仅是听埃及本地人的介绍，因而不是根据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失真和错误之处难免，在利用它们时，必须用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去印证。因此，现代的埃及史家仅以他们提供

的资料作一种参考和补充，而主要依靠古埃及文献和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

古埃及文献资料，大多是通过考古发掘或发现得来的，它们或者刻在石头上（如石碑上、建筑物的墙上、柱子上），或写于纸草之上。一百多年来，在埃及进行的无数发掘，提供了大量的古埃及文献资料，为埃及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是，古埃及文明历时几千年，文物和文献损失严重，现在人们掌握的资料很难涵盖其历史的各个时期及各个方面；而且还有许多已发现或发掘的资料尚未公布和译成现代文字，因此，也还未能成为研究的对象。

文献材料大约包括这样一些方面：

王表：如曼涅托的《埃及史》、^①第 19 王朝时编的《都灵王表》、《阿卑多斯王表》等。

年代记：如第五王朝时编定的《上古埃及年代记》（即《帕勒摩石碑》），反映了从前王朝晚期至古王国时代第五王朝时的情况；《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反映了新王国时期第 18 王朝国王图特摩斯三世的历次远征的情况。它原写于皮卷之上，已佚，现仅存刻于卡尔纳克神庙之上的一个摘录本。等等。

传记，大多刻于墓中，如第 3—4 王朝之交的《梅腾自传》，第 5—6 王朝之交的《大臣乌尼传》、第 18 王朝初年的《桡夫长雅赫摩斯传》等，它们反映了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如官制、军事、土地制度、奴隶制度等）。

战记，如《阿蒙霍特普二世的亚细亚远征》、反映了新王国时期第 18 王朝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的一次远征叙利亚的情况；又如

^① 曼涅托为公元前 4—3 世纪的埃及祭司，他为征服埃及的希腊统治者写了一本《埃及史》。现该书已佚：只存有从各古代作家著作中摘出的一个辑录本，构成一个王表，及每个国王的一些活动。即《劳埃布丛书》中的 Manetho（曼涅托）。

反映拉美西斯二世（新王国时期第 19 王朝法老）同小亚强国赫梯进行争霸战争的《卡尔纳克石碑》等。

王家铭文 如第 10 王朝国王阿赫托伊给其子美利卡拉王的教训，反映了该王朝在第一中间期的乱世之中如何加强王权、巩固统治的政策声明；第 19 王朝的法老霍连姆赫布的敕令，反映了在第 18 王朝末期的埃赫那吞改革失败后，国王为巩固自己的权力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其中关于保护涅木虎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古王国末期的众多国王的敕令，主要是保护神庙利益、豁免神庙及其劳动者的义务的，反映了古王国末期王权对神庙势力的依赖等。

科学文献 如《莫斯科数学纸草》、《艾贝尔斯医学纸草》等，反映了古埃及的数学，医学等方面的成就。

私法文书：如在卡呼恩地方发现的商业文件；在法雍绿洲发现的《麦西档案》等，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

《西奈铭文》，反映埃及人不同时期在西奈地方的活动（主要是对此地铜矿的开采）。

《哈特努布铭文》，是在埃及中部哈特努布采石场留下的铭文，对了解第一中间期至中王国时期的涅杰斯阶层的情况提供了不少资料。

捐赠铭文：有国王给予神庙的各种捐赠，如《哈里斯大纸草》中记载的拉美西斯三世给各类神庙的捐赠（包括土地、劳动力及其它财产）；有贵族给神庙的捐赠（如阿蒙霍特普三世的一个总管留在一个调色板上的铭文），等等。

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颂歌、寓言、神话。小说主要是短篇，如《两兄弟的故事》、《辛努海的故事》、《船舶遇难记》等；诗歌如劳动者的歌，竖琴之歌等；颂歌如《尼罗河颂》、《阿吞颂诗》等；寓言如《魏斯特卡尔纸草》上的寓言故事；神话如孟斐斯神学、希利奥波里神学等。

外交档案：主要是第 18 王朝中后期的阿马尔那档案，反映了当时埃及同西亚各国的关系以及埃及同其叙利亚巴勒斯坦属地之间的关系。

《金字塔铭文》、《棺铭》和《死者之书》等，反映了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等时期的祭祀仪式和对死者的祈祷。

经济文献：如《维勒布尔纸草》，它是第 20 王朝时期对埃及中部部分地区的土地丈量清册，丈量的是王室和神庙土地，它记录了各个地块的主人、面积、租种者的姓名，成份、数量，以及应纳租税的数额等。

研究古埃及历史的第三类资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实物和艺术作品，这方面的资料十分丰富。如城市建筑、坟墓、金字塔、园雕、浮雕、绘画、日用品、纺织品、石器、陶器、金银制品、象牙制品、青铜制品、玻璃制品等。

现在所知已译成现代文字的古埃及资料集有如下一些：

布利斯特德的《古代埃及文献》（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1906 年出版，共 5 卷。其中第一卷包括中王国及其以前的时期；第二卷包括第 18 王朝的文献；第 3 卷包括第 19 王朝的文献；第 4 卷包括第 20 王朝及后期埃及的文献；第 5 卷为索引。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完全的一套资料，还没有别的资料集可以完全取代它。

李希泰姆的《古代埃及文献》（M·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1975 年版，共 3 卷，其中第 1 卷反映中王国及其以前的情况；第 2 卷为新王国的资料；第 3 卷为后期埃及的资料。

《第 18 王朝后期埃及文献》，共 3 卷。

加丁内尔编的《维勒布尔纸草》，共 4 卷，第 1 卷为纸草文献原文及拉丁文注音，第 2 卷为注释；第 3 卷为英文译文；第 4 卷为索引。

彼特里编的《西奈铭文集》，搜集了古埃及人在西奈地方留下的文字记录。

《哈特努布铭文集》等。

另外，普利查德主编的《古代近东文献》（J·B·Pritchar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苏联的司徒卢威主编的《古代东方史文选》，（1963年版），和罗斯托夫采夫等人主编的《古代东方史文选》（1980年版）中也搜集了不少古埃及文献资料。在《埃及考古学杂》（《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上和《古史通报》上也发表了不少有关埃及的资料。

在许多有关古埃及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公布了不少铭文资料。

解放以来，在我国也先后出过一些有关古代埃及的文献资料，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合编的《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上下）中，有一部分是古代埃及的文献；林志纯先生选编的《古代的埃及和两河流域》、《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中均有关于古代埃及的文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及中古史教研室编辑的《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中也有一部分属于古代埃及的文献。

史学史虽然，对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在西方从古代就已开始，但真正的埃及学却是在近代才建立起来的，它开始于法国学者商波良释读成功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商波良释读成功埃及的象形文字绝非偶然。这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他个人的努力。

1798年，法国拿破仑远征埃及，他手下一个名叫布萨的军官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罗塞塔一座残破的城堡里，发现了一块用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字刻成的三语言石碑，即著名的罗塞塔石碑。这块石碑被运回法国（后来落入英国人手中），并制成了拓片。瑞典一位名叫阿克布拉德的外交官（当时正在巴黎）得到了一份拓片。他对石碑上的希腊文和世俗体

铭文进行了比较，成功地在世俗体部分认出了全部希腊文部分的专有名字。但他没能再前进一步，因为他认为象形文字是字母文字，从而妨碍了他正确地去释读象形文字。

在商波良之前，还有一个人在释读成功象形文字的过程中有过贡献，他就是光的波动说的创始者，英国人托马斯·扬。他于1814年得到了一份罗塞达石碑铭文的抄本。他在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古埃及文不是字母文字；他还发现，铭文中的希腊文部分有许多重复的字；他认识到象形文字部分中的椭圆形框子中的字是国王的名字，认出了托勒密（Ptolemy）和伯林尼斯（Berenice）这两个国王的名字。但释读成功象形文字的不是他，而是商波良。

让·弗朗索瓦·商波良，1790年12月23日出生于法国南部洛特省的一个小城市。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是书商。他从小就对语言，尤其是对东方语言有浓厚的兴趣，并在语言方面有惊人的天才。在小学和中学时期，他通过刻苦自学学会了希腊文、拉丁文、古希伯来文、阿拉伯文、阿拉比亚文、科普特文等。还在上中学时就着手编纂多卷本《法老统治时代的埃及》。到中学毕业时，他已准备了该书的个别章节，并拟制了古代埃及的详细地图。1814年，该书头两卷问世。

商波良释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历了挫折和失败。他和他的前辈一样，曾认为象形文字是象征性的。

1808年，他获得了罗塞塔石碑上的铭文，并遵从普鲁塔克关于埃及人有25个字母的断言，开始从《罗塞塔石碑》铭文中去寻找。他也象他的前辈一样，从王名、王后名、地理名称入手，逐步地确定了大部分世俗体的字母。同时他发现，古代埃及人也象阿拉伯人和其他某些东方人一样，忽略了元音，而经常地不将元音写出。他还发现，在古代埃及不是两个，而是三个文字系统（即象形文字、僧侣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且彼此是紧密相联的。

不过，开始时他认为最古老的文字是世俗体，而后才演化出僧侣体和象形文字，从而将其发展顺序弄颠倒了。

1921 年底，商波良定居于巴黎。这时，他改正了自己有关象形文字的一些错误观点。他认识到，古埃及文字是发声的，而不是象征性的；世俗体有字母表，象形文字也有字母表。

他也象托马斯·扬一样从托勒密这个名字来开始研究、释读象形文字。他早已知道在罗塞塔石碑上的世俗体铭文中这个名字是用什么样的符号写的；他也知道包括在哪一个圈子中的那一组象形文字与这个名字相符。而且到这时，他已掌握了介于象形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之间的僧侣体的很多符号。他不仅认出了托勒密这个名字，而且用世俗体、僧侣体和象形文字符号将其写了出来，证明托勒密这个名字中的 7 个象形文字符号都是发音的，以及它的每个符号发什么音。

后来，他又获得一个双语言铭文，其上不仅有托勒密的名字，而且有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他先用僧侣体符号替换出托勒密这个名字的世俗体符号，而后又替换出它的象形文字符号。他还尝试读出了克列奥帕特拉这个名字。但这两个名字都是希腊人统治埃及时的王名，在此以前的埃及人是否也使用这些符号呢？

1822 年 9 月 14 日，一个有图特摩斯和拉美西斯名字的铭文到了商波良手中，并被释读出来，这两个人比希腊人统治时期早了一千年。这说明，古代的埃及人也是用象形文字字母来写任何人的名字的。这样，商波良就是自罗马人统治以来第一个用古埃及原来的语音读出古代埃及法老名字的人。

1822 年 9 月 22 日他宣读了他释读成功古埃及文字的报告，该报告以致达西尔 (Dacier) 先生的信的形式发表，从而宣告了埃及学的诞生。

但当时，商波良仅仅读懂了一些词和个别的句子，还有更多的象形文字尚待释读；他的成就还未为人们所承认。1832 年 3 月

4 日,年仅 42 岁的商波良因过度辛劳而辞世。1866 年,一个新的双语铭文被发现且被释读,这就是坎诺普 (Canopus) 敕令,从而证明了商波良的成就。

此后,在 19 世纪,埃及学家的任务一方面是继续释读象形文字,编写象形文字字典和文法(从 1867 年起,先后出版了萨缪尔·伯奇的象形文字字典,海因里希·布鲁格士将其扩编为七卷本的《象形文字一世俗体字典》;路德维希·施特恩的《柯普特语语法》和阿道夫·埃尔曼的《新埃及语语法》;1885 年,海因里希·布鲁格士出版《俗体文文法》;1894 年,阿道夫·埃尔曼出版小册子《埃及语语法》1897 年,埃尔曼及其同事开始编纂《埃及语词典》(全书词汇超过 150 万字,但未出完);1889—1902 年,库德·塞特出版《埃及语动词》;1924 年,巴蒂斯塔默·冈恩出版《埃及语语法研究》;同年,塞特的《埃及文读本》出版;1940 年,A·德布克出版《埃及语读本》;1957 年,伽丁内尔出版了《埃及语语法》等);另一方面,是搜寻更多的古埃及象形文字铭文。因为在商波良时,这种文字的资料还是很少的。于是,在商波良释读象形文字后,大批欧洲人涌入了埃及,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和发现。

但在 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谈不上科学的考古发掘,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科学的考古学尚未确立;另一方面,许多人发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掠夺。如英国驻埃及总领事亨利·沙特的使命之一就是为大英博物馆搜集古物;法国驻埃及领事特洛维梯也是披着外交官外衣的古物收集者;意大利人吉奥凡尼·贝尔左尼则是为亨利·沙特搜集、发掘古物。这些劫掠性的发掘物后来在欧洲出卖,成为伦敦、巴黎、华盛顿和都灵等地国立博物馆的主要陈列品。这时的发掘对埃及文物破坏极大。

但以列普修斯为首的一批德国考古学家尽可能地记录了埃及地面上的文物,是很有意义的;以马利埃特为首的一批法国考古

学家在埃及进行了三十年的考古发掘，并建立了开罗博物馆，为埃及考古学作出了贡献。

对埃及考古遗址进行细致而有系统的清理，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如彼特里在涅伽达、阿卑多斯以及其它许多进行的发掘，不仅为埃及史提供了大批可靠的文物、文献资料，而且为科学地进行考古发掘树立了榜样。其他考古学家对金字塔区的发掘，对行省贵族墓的发掘，对图坦哈蒙墓的发掘，对阿马尔那的发掘，对希拉康波里的发掘……等，对埃及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古代埃及史正是建立在由考古发掘和发现所提供的古埃及文物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用古埃及本身的文献资料写埃及史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在这方面，法国的马斯伯乐、美国的布利斯特德开了先河。马斯伯乐写了《古代东方各民族古代史》，他利用了 19 世纪所能得到的一切资料，第一次把古代埃及的历史和文物纳入到古典东方历史发展的广阔范围之中。他详细地研究了古代埃及的文化、语言、艺术和宗教，确定了埃及宗教和艺术发展的主要阶段。但他是从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问题的，过分夸大了宗教的作用，对史料也缺乏批判性。

本世纪初，美国著名埃及学家布利斯特德在将古埃及文字资料译成现代文字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编辑了五卷本的《古代埃及文献》(Ancient Records of Egypt)，为古代埃及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他还根据这些资料出版了通史性的《埃及史》(古代部分)，叙述了从前王朝至波斯人征服时为止的古代埃及历史，将象形文字资料纳入到了通史中来。但他的埃及史对政治等方面注意多，对社会经济很少涉及。

彼特里则主要根据考古文物资料写了《埃及史》(二卷本)，从前王朝至新王国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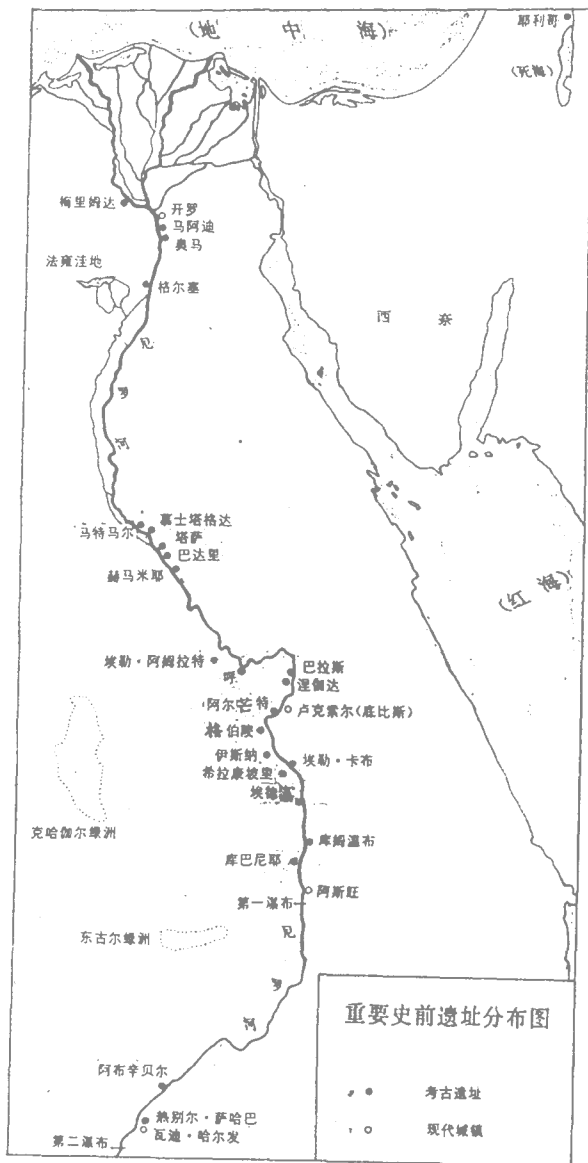
此后，埃及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众多的埃及学家利用

象形文字资料和文物资料，对古代埃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乃至日常生活进行了研究，出现了许多成绩卓著的埃及学家，写出了许多通史、专史方面的著作（包括普及性的著作）。文献资料方面也有新的出版物。

但是，总的来说，对古代埃及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得还很不够，尤其是西方学者，至今还未出版一本关于古代埃及社会经济方面的著作（除巴凯尔的《法老埃及的奴隶制》之外）。在这方面，前苏联学者作的工作要多得多，他们也比较注重这方面的问题。如50年代初，他们对古王国时期的生产者麦尔特的争论；20—30年代以来对古代东方（包括埃及）社会性质的争论；一些古代埃及社会经济史方面的专著的出版（如萨维里耶娃的《古王国时代埃及的土地制度》，别列别尔金的《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大官经济》等等）。

现在，埃及学中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如埃及居民的起源问题；农业起源问题，国家起源问题，各种生产者的身份问题（如麦尔特的的问题等），喜克奈斯人的成份问题等等。这有待于考古发掘提供新的资料，也有待于对现有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分析，从而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

古代埃及史



重要史前遗址分布图

第二章史前时期的埃及

一、旧石器时代的埃及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人们曾经认为，埃及的历史只能追寻到两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但是，本世纪以来的许多考古发掘，把埃及的历史推到了六、七十万年以前。^①

早在上一个世纪的 1867 年，乔弗里·贝比曾展览过一些埃及史前时期的人工制作的工具，其中包括早期旧石器时代的片状工具。

本世纪 20 年代，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美国著名埃及学家亨利·布利斯特德组织了一个考察组，对埃及的史前时期进行考察。他授权给地理学家、考古学家 K·S·桑德福德和 W·J·阿尔基尔对尼罗河谷及其台地的地层年代进行了考察，确定了尼罗河谷地及其台地的地层年代。

考古资料表明，埃及的旧石器文化有始石器、早期旧石器、中期旧石器和晚期旧石器等一系列文化。

本世纪 20 年代，考古学家在开罗附近的阿巴西亚冲积层里发现了砍砸器，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被称为始石器（*eo*liths）。在埃及的近邻，这种始石器实际上早在 1880 年就被一个德国的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乔治·斯契温福德发现过。

现在所知旧石器时代早期下尼罗河谷最早的工具，来自阿布

^① 据霍夫曼：《法老前的埃及》（M·A·Hoffman, *Egypt before the Pharaohs*），前言，XIV；J·基博主编：《非洲通史》，中文版，第 1 卷，第 33 页注③。